

论德拉布尔《红王妃》中幽灵的意蕴

吴丽娟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京 江苏 210093)

摘要:德拉布尔的《红王妃》以新颖的创作手法吸引了学界和大众传媒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学界关于小说中后现代叙事以及幽魂叙事的探讨。然而,这些颇有价值的研究却忽略了小说中最为独特的设置——幽灵,事实上幽灵的存在融合了作家在小说的修辞维度、历史维度、时间维度上的种种期待。德拉布尔通过对小说中幽灵的书写关联到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这样的创作不仅体现了她本人的后现代创作观,也间接促成了作家对当下时代的关照以及个体存在问题的拷问。

关键词:《红王妃》;幽灵;解构;生成;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1-0058-05

在评论家眼中,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是一位优秀的“妇女小说家”^①,她善于采撷生活的枝叶,细腻地刻画不同阶段女性的生存状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拉布尔的创作虽以女性为对象,却又限于对女性群体的研究。德拉布尔本人曾表示,小说的功能性乃是“不断扩展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发掘新的领域,并且探索一种适宜个体生存的可能方式”^②。她的小说《红王妃》(*The Red Queen*, 2004)以一位辞世200年的朝鲜王妃的幽灵展开叙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创作理念。学界目前对《红王妃》的解读虽然层出不穷,但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幽灵。实际上,在《红王妃》中,幽灵被作者赋予了极为丰富的意蕴。从后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来看,幽灵属于“后人类混合物(posthuman amalgams)”^③,是经过艺术化处理的叙述中介,而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批评立场来解释,幽灵将我们卷入的是“一个由差异构成的网络系统,它并非一个存在于书页空白之间的内容,也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写作集合,它是一个由踪迹构成的织物”^④。由是观之,幽灵在小

说叙事进程中的“踪迹”应是我们破译文本极其重要的线索。细察之后,我们意外地发现幽灵总是有意淡化、逃离身为叙述者应该履行的文本职责,反而格外地倚重并且施行文本的修辞功效,进而解构文本的密闭空间。更为诧异的是,幽灵的这种“逃离”还解构了一段久远的朝鲜王朝的历史。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幽灵在小说中大行“解构”之术?这种对文本、历史的双重“解构”最终导向的结果是什么?德拉布尔创造幽灵的写作动机又是什么?本文试图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德里达的哲思来一同解谜,审视幽灵在小说不同层面暗涵的意蕴。

一 幽灵的修辞功效及其解构策略

从小说的创作角度来看,《红王妃》是一部兼具修辞功效和完整意义双向性质的文本,它既是叙述者幽灵的回忆叙事,也掺杂了作者在创作中融入的解构策略。小说开篇,德拉布尔凭借幽灵浓郁的死亡之音率先解构了传统小说中所认为的叙事者——作为“叙事(故事)人,铭刻在文本中”

收稿日期:2021-08-11

作者简介:吴丽娟(1989—),女,安徽铜陵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英国小说研究。

①Rose, Ellen Cronan. *The Novels of Margaret Drabble: Equivocal Figures*. London: Macmillan, 1980, p. 53.

②Poland, Nancy. “Margaret Drabble: ‘There Must Be a Lot of People Like Me’”, *Midwest Quarterly*, 1975, 16(3): p. 264.

③Clarke, Bruce. *Posthuman Metamorphosis: Narrative and System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

④Derrida, Jacques. “Living on: Borderlines”.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Ed. Harold Bloo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p. 69.

的理解^①,同时还颠覆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认知。从叙事话语来看,小说中的幽灵与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过世之人也有很大不同,幽灵极富才华与智慧,擅长使用复杂优美的句式,还常常不经意间谈论一些不属于它的概念,类似“后现代文本主义、普救教化论、解构主义、自我概念”^②。如果以现实世界为依据来看,幽灵展现出的这些能力很显然都超越了人类正常的属性。但是从修辞维度来理解,这恰恰为改造传统的思维模式提供了途径,作者的重心在于通过幽灵建构某种“幻觉”,从而揭示文本层面的潜在话语,以达到某种现实的效果。

以语言的修辞维度为切入口,德拉布尔继续为幽灵搭建解构平台,她建构了一个文本的再生机制,使得文本走向德里达语境中的“双重阅读”。德里达认为,“双重阅读”在于“一种追求破译,梦想破译某种逃脱了游戏和符号秩序的真理或源头,它将解释的必要性当作流亡并靠之生存。另一种则不再转向源头,它肯定游戏并试图超越人与人文主义、超越那个叫做人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在整个形而上学或存有神学的历史中梦想着圆满在场,梦想着令人安心的基础,梦想着游戏的源头和终极”^③。回到《红王妃》中,不难看出,在幽灵几近反复的讲述中,它所侧重的是留存于客观叙事中对文本的“游戏”。这是一个有层次,既可颠覆,又可被颠覆,能够实现“翻转”的文本机制。这一点主要建立在幽灵不断自我颠覆的基础上:“我在生之时写下了我的人生故事,而且有几个版本。不谦虚地说,写得非常好。”不久之后,我们便在小说的其他地方读到:“我会力求真实,但我不敢打保票,也许鬼魂也会自欺欺人呢,谁说得准呢?”类似的例子还有:“假如我丈夫出生在现在,生在你们这个时代,那他的病恐怕属于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一类。当然,我只是随便说上这么一句,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毕竟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一来一往中,肯定与否定的力量在文本中相互交织,作者借助创作中的修辞技法从文本的内部对其进行推翻、颠覆,从而“进一步揭示它的矛盾和悖论、从中开发出新解构新文本的批评”^④。那么,面对如此灵活、“嬗变”的文本形态,

我们该如何明辨幽灵存在的意义,从而进一步洞悉文本的意义呢?

其实,德拉布尔借助幽灵期望实现的是文字的自我重构效应,从而让文本的意义自行滑动,直至还原文本最初物质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中的幽灵无论是作为叙事的中介,还是作为烘托文本修辞功效的媒介,其语言的深层意义都有赖于背后的阐释主体。这个主体既可以指向小说中的隐含作者,也可以指向文本之外的真实作者。但问题是,小说中不论是隐含作者还是真实作者都经常选择“隐身”,而这种“隐身”的操作恰好与我们在前文所说的作者通过幽灵的修辞功效建构的“幻觉”相吻合,从而再次解构传统的思维模式。如此的写作方式被德里达称之为“隐退性写作”,即“使作者不再显得是作品的中心,而是作者和原意都不出场”^⑤。有一点不同的是,在《红王妃》中,作者和叙述者的“隐身”其实是为小说创造“索引”,好让读者可以展开文本的解码与破译活动。在由芭芭拉叙述的小说的现代部分,王妃的回忆录毫无征兆地就出现在三万英尺的高空:“在那小小的、深绿色的旅行箱里,一本《王妃回忆录》正等待着她。”小说接下来也并没有明确透露幽灵是如何进入芭芭拉的身体,乃至思想的,一切都布满了悬疑。这种诡异的气氛,其实暗示了幽灵亦或是芭芭拉都在退让出身为叙述者的主导地位,情愿以隐退的姿态充当这种神秘的力量,并且借助“悬念”来实现文本的意义增殖。

可以看出,德拉布尔利用“幽灵”给小说嵌入“解构”的元素,不仅在语言的修辞功效上颠覆了传统的话语秩序,使得文字的“戏虐性”跃然纸上,还通过“双重阅读”与“隐退性写作”的方式凸显了小说的动态性、反对固定化,强调文本中不存在可获得的确切意义,一切都需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颠覆以往的思维模式,从而创造意义,构成文本独有的话语。

二 幽灵的历史内涵与表征

幽灵携带的这种“解构”功能不仅游走于小说的语辞之间,在小说的历史维度同样也不可忽略。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介入将持续为故事的

① Prince, Gerald.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p. 65.

②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红王妃》,杨荣鑫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③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24页。

④ 肖锦龙:《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⑤ 汪堂家:《汪堂家讲德里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展开提供丰富的背景材料,为幽灵对历史的评述搭建平台。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幽灵便成为铺陈文本中历史背景的关键一环。但是,幽灵在这段历史的表征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德里达的长文《赠予死亡》中,德里达曾对捷克现象学家帕托裘卡(Jan patočka)的文章《关于历史哲学的异教论》进行过阐述,帕托裘卡在文章中将秘密(secret)与责任相关联,尤其是将神圣性的秘仪(mystère)^①与责任相关联,并且强调两者的异质性:“一方面是历史性的秘密—历史性的人类难于承认却必须承认历史,因为它与人的责任休戚相关;另一方面是狂喜般的秘仪的秘密,责任的历史必须与之划清界限。”^②在这一点上,需要找到一个中介让秘密的历史与责任的历史形成具有转向、展开、回转的螺旋形式。

从小说中提供的历史线索可以看出,小说再现的时代为朝鲜王朝英祖李昉当政时期。考据显示,历史上的英祖虽在血雨腥风的党争漩涡中即位,却政治清明。自1724年继位之后,他首先恢复了朝鲜当时昙花一现的普遍兵役税,为了减轻务农者的负担,英祖向全国平摊征收的兵役税削减一半。除此之外,英祖还热心地推广用韩文印刷的重要书籍,包括《表义录》《百行录》《警世问答》等。而幽灵笔下的英祖则被赋予了更多细节上的刻画:性格怪癖、独断专权,“时而虚荣时而简朴,有时滴酒不沾,有时又成天烂醉如泥,一些时候装腔作势,一些时候又谨小慎微”。虚构与史料之间的微妙差异构成了责任的历史与秘密的历史之间的对立。然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幽灵才得以发挥其“重整乾坤”的内在效力。1762年的夏天,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一封措辞恶毒的检举信呈上了国王的御案”,这便是轰动历史的“壬午祸变”的开端。小说中最先感受到祸事降临的是身处后宫的王妃,可是她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自己的丈夫一步步走向死亡。与史书的侧重点不一样的是,幽灵将这一事件置于最寻常的父子伦理关系之中,以个人体验为轴心,串起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将历史的伤疤层层揭开:“遍查我们的历史记录,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冷酷、如此残

忍、如此肆无忌惮的父王,毫无顾忌地杀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于是,父亲英祖的“恶”被放大了,并且在幽灵循环往复的批判中愈发地有重量感。由此,我们发现,在看似固定不变的人物和历史事件中,生成了新的阐释力,即一种极端权力笼罩的君主体制造就了极端的父子关系。在此契机下,“壬午祸变”在幽灵理性的推进中慢慢展露出与历史不同的内涵。这是一个奇异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德里达所说的“异延”(différance),即“在一种无法在场/缺场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被认知的结构和运动。异延是差异的系统游戏,是差异的踪迹”^③。由此,幽灵作为一种原型差异,似一把无坚不摧的利箭,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传统的史料在这种非本原的差异之源面前,窘相毕露,摇摇欲坠。

于是,幽灵带着现代的思想与历史的责任感,在时代之间传达一种新的指令,确立一种当代的新的历史理解和历史任务。让我们再将时间追溯到英祖在位期间的那个时间段,即历史上的18世纪,这一时期是人们对自然探索的萌芽期。政治上,欧洲各国分别在东南亚与大洋洲建立殖民据点,各国之间通商贸易频繁往来,而此时多数的王权国家,如法兰西帝国、奥地利帝国正处于全盛时期,但民主思潮逐渐燃起,并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影响最盛。学术上,孟德斯鸠出版《论法的精神》(1748)、卢梭出版《社会契约论》(1762)、康德出版《纯粹理性批判》(1781),这些哲人在作品里表达的思想感染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小说中的幽灵所言:“不管怎么说,我相信,人性精神和启蒙的曙光还是影响到了我的早期教育,也在我死后才问世的这本书里有所反映。”小说中反复强调这一段历史的与众不同,铺陈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代替了幽灵。幽灵的作用进而演变为项论辩性的活动,它会直接以现代人的眼光揭露历史上朝鲜王朝发展中的一些弊端,它认为当时朝鲜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有很多难以铲除的野蛮愚昧的陈规陋习,而作为社会体制基础的儒教又是百足之虫,这甚至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都无法撼动的。

幽灵在对历史的解构下逐步展示其思想的独

①本文对“mystère”的翻译“秘仪”采纳的是王钦在《赠予死亡》中的翻译。“mystère”最初的意思为“隐藏仪形,封闭起来的”,在帕托裘卡的研究中主要指的是古时候崇拜特定神灵的祭祀仪式,而在德里达《赠予死亡》中,“mystère”主要与“秘密”相关。本文借助德里达对“mystère”的隐喻指代《红王妃》中那一段介于真实史料与幽灵叙述的历史之间的差异。

②德里达:《赠予死亡》,王钦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10页。

③德里达:《多重立场》,余碧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8页。

立性。由此,我们可以更加确信小说中一直探讨的幽灵并非典型意义上没有生命的幽灵,幽灵这一词只是象征性地指向了一种虚无,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性虚构。这样的处理方式,倒让幽灵获得了某种哲学意义上“存在”的潜能,而这一潜能所衍生出的属性又将幽灵推入了另一个深渊——时间的异质场域。随着文本历史的完结,幽灵将会面临新一轮自我重新生成与阐释过程中所衍生的问题与潜能。

三 幽灵的时间错位与复现

复活的紧要性不断逼迫着幽灵一次又一次的往返,到底是再生还是还魂?这些问题暂时都不得而知。但是从德里达那里,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的线索:“想要存在的幽灵,就必须有躯体的返回。但必须是返回到比过去更为抽象的躯体。”^①因为,只有一副实实在在的躯体,一个血肉之躯才会为它增加一个补充的维度。如前文所述,在小说现代部分登场的芭芭拉·霍利威尔博士与王妃似乎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她们虽然远隔时空,但是生活经历却暗自重合,甚至可以说,芭芭拉“重演”了王妃的生活。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她们二者之间的关系:芭芭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构成幽灵的“复活”?或者,我们也可以从其对立面来发问,芭芭拉难道是专门为了“复活”幽灵而来的吗?从德里达的观点来看,幽灵的回归成全了时间的倒转,它将过去返还现在,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在过去未被抵达的正义。这一解释运用在小说中幽灵的身上同样也合情合理,因为小说中的幽灵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在指向过去的某个事件或者某个时间点,同时借以构筑相似性与在世之人建立对应关系。如此这番,便暴露了小说另一个更为隐秘且重要的维度,即幽灵在时间维度上的存在。

《红王妃》中幽灵的时间轨迹充满了错位与脱节,让人匪夷所思,它不是一种组织原则,更像是一种机体感受。如果跟随时间的自然脚步,王妃去世之前,时间并未落入轮回的沼泽。肩负当下生存任务的王妃更多地是让自己安于一个生活中的角色,留存于时间之中,而在王妃去世之后,幽灵出现之前的那段时间被禁锢了,它离弃了一种既定的本质,成为一个复合的概念被导入了生命生成的轨道,德里达称之为“一个幽灵般的时间”^②。

刻,一个不再属于任何时间的时刻”^②。当幽灵再次按下历史的重启键之后,时间已经重新洗牌,它打破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的完美境界,却又让它们之间彼此孤立绝缘,如此幽灵便在此刻恰好见证了自我在时间之域中的坠落,且无力挽救。于是,此刻的幽灵身处一种“宇宙之外”的时间的尴尬中,空有一副意义的皮囊,却反而标记了自我的缺席。幽灵逐渐意识到没有时间带来的是不安和恐惧。所以,芭芭拉的出现是时间向幽灵重新开启的又一道阀门,这一次当时间愿意充当填补愿望的媒介时,幽灵便顺理成章的到来了。

幽灵从一个充满主动力量的领域重新出发,并依赖这一场域,以此作为随机运转的隧道,生命之物自我经营,生成得以展开。幽灵向我们讲述思悼之死时,她不断地穿梭在过去与当下之间,随时向我们更新事件的进展,从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三点讲到下午四点,又到当天晚上,还时常以旁观者的身份,以时间为切入点表达当时的焦虑和不安感:“拖得太久了,已经听得见国王在殿上愤怒地尖声叫嚷。”“写到这里,我真的无法用任何语言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从事件的被述层面来看,一个整体的事件被切割成很多段,好像在放慢的时间中一个接一个出现。思悼在短短的八天内,先是被告知自己大限将至,继而产生恐惧,侥幸存活的一丝期盼未能实现,最后被闷死在米柜里。单看这一系列的快镜头序列,虽然占用了小说长达十页的叙述篇幅,但就被述时间来看是十分短暂的。在时间的推移中,幽灵重新生成,并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他的死,我的死,饿死,淹死,抹喉,还是吊颈,我做何选择?”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反观由幽灵牵扯出的王妃的宫廷生活,那是个体的一种绝对自我性和孤独性,而打破这一密闭空间的正是王妃个体的消亡。从这个角度来讲,时间确立了最内在的独一性,通过与他人的伦理关系而展现出一种回旋。在这个基础上,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才能建构成一种既相互吸引又各自独立、保持异质性的状态。

幽灵与芭芭拉皆浸润在时间之中,从一种虚拟(过去)形式朝向另一种虚拟(未来)形式之间运动。这一过程通过两人的视角,分别呈现了两次:第一次,王妃以自己幽灵的身份尾随芭芭拉,立即认出了那是自己正在寻找的替身:“我们注

①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②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视着她,而她对我们的闯入却全然不觉。”“我们就像长着双翅的小密探,挤挤撞撞地聚成一团,浮游在天花板下,俯视着床上这个睡不安稳的女人。”然而,芭芭拉此刻并没有同时感受到被王妃所认,她只是认为《回忆录》“唤起了她对自己生活的回忆,但在记忆中复苏的惟有恐惧和悲伤”,因而最初的芭芭拉存在于虚无之间,内心充满了渴望与被排斥的痛苦。但幽灵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终将复返。幽灵一再尾随着她,要求她认领自己。于是第二次对视,芭芭拉给予了回应,她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那个烈日暴晒下的庭院,王妃坐在阴凉处焦急地等待,而她的丈夫在哀求父王饶他一命”。这一来一回在吸引与追逐之间、清晰与虚无之间游走的叙述,我们看到死亡与新生、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所有这些都共同指向那个绝对异质性的他者(幽灵)——他者终将被抵达,却无法被触摸。换言之,在生命之中,在意识

之中,芭芭拉促成了幽灵的一种自体向上、直达不确定领域的生成运动,而在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时间里,也成全着一种共享关系和一种共存状态。

结语

《红王妃》中的幽灵无疑包含着丰富的意蕴,它不仅向我们证明了德拉布尔后期创作的成功转向,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所谓“脱节”(out of joint)的时代中,在生命、时间、历史、身份这些概念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幽灵彰显了其极为重要的梳理功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需要幽灵的回归,需要幽灵质疑、置换和消解我们的思维习惯。通过《红王妃》这本小说,德拉布尔促使作为读者的我们学会同幽灵共存。与幽灵共同生存也是同他者共同生存,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德拉布尔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

The Implication of the Ghost in Drabble's *The Red Queen*

WU Li-ju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Margaret Drabble's novel *The Red Queen* has been highly concerned by academia and mass media since its publication. The creative techniques in the novel have been touched off a heated debate about the postmodern narrative and the ghost narrative within the academia. However, among the valuable researches, the most unique setting, i.e. the ghost is ignored. Actually, the ghost has fused into the rhetorical dimension, historical dimension and even the time dimension that Drabble expects to fulfill in the novel. Meanwhile, Drabble's depiction of such a ghost has related to some important events in history. It not only represents her postmodernist writing standpoint, but also helps to bring out her unique care of the times and individual exist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Key words: *The Red Queen*; the ghost; deconstruction; formation; Margaret Drabble

(责任校对 王小飞)